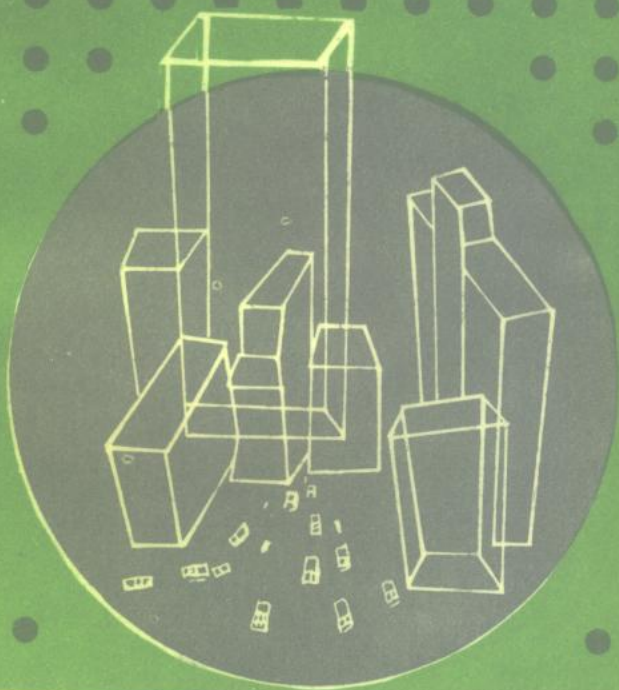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

抗战时期西南的金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资料丛书

抗战时期西南的金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

抗战时期西南的金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重庆

157

(川) 新登字 019 号

责任编辑 冯玉荣 杨耀健

封面设计 王 颖

抗战时期西南的金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北碚)

重庆嘉陵印刷厂印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875 印张 373 千字 2 插页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621-1101-4/K·56 定价: 7.50 元

《抗战时期西南的金融》

编审人员名单

主 编：徐朝鉴

编 审：（以姓名笔划为序）

王建西	刘 丽	冯小露
宋广珍	李宗杰	李建恩
李 硕	杨耀健	张建军
姜梦弼	唐泽安	陶才桢

重庆打铜街，交通银行总行旧址。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供稿）



重庆新华路，美丰银行旧址。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供稿）



重庆道门口，中央银行总行旧址。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供稿）



重庆新华路，中国银行总行旧址。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供稿）



《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出版说明

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具有扭转乾坤的伟大意义。西南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它为取得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编纂《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目的在于促进对抗战战争史的研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服务。

《丛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力求真实地反映当年西南地区全民全面抗战的情景和巨大变化，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丛书》以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为主，根据抗日战争时期大西南的实际情况，拟编辑出版十本书，即《大西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大专院校》、《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工商企业》、《抗战时期西南的统一战线》、《抗战时期西南的交通》、《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抗战时期西南的金融》、《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和《抗战时期西南的科技》。上述各书均由四川省政协、云南省政协、贵州省政协、西藏自治区政协、重庆市政协、成都市政协、昆明市政协、贵阳市政协及拉萨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部门参加的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辑，并于1996年前陆续出版。

这套《丛书》得到各界人士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热情地为本《丛书》撰稿，分别寄给上述协作单位汇编成书出版、发行，实属费心尽力，本《丛书》各协作单位特此深表谢意。

前 言

本书是《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之八，是在深化改革、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献给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一本文史资料专辑。它广泛搜集金融界人士亲历、亲见、亲闻的稿件，经过核实、整理和选编，集中反映抗战时期大后方金融业的概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八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大西南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谱写了最为悲壮和光辉的篇章。斯时，由于国防形势的需要，沿海及沿江地区有近千万人迁移至大后方。其中，约有近百家银行、钱庄、金融和保险机构随迁，并随时保持着正常的运转，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对供应战时的军需、民用和奠定大后方的金融基础，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武力强弱，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双方人力、物力、财力的对抗。战争一旦爆发，交战各国都要求各自的财政金融服从和服务于战争，并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以保证战争的需要。因此，中国的战时金融有其鲜明的特征，那就是颁布和实行一系列带有强制性的方针和政策，以确保经济上的总动员。

中日战争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日本，已是一个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强国。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生产力低下，币制和金融极其紊乱，对外贸易连年入超，军队虽多，武器装备和战斗力却十分低劣。抗战初期，敌骑之所以能横行无忌，步步紧逼，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日军侵占武汉后，进一步榨取沦陷区民众的血汗和资财，并

利用沦陷区的人力、物力支撑其侵略战争，以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国民政府针对这种新的形势，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经济”的口号，作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略方针，把战时经济放到至关紧要的位置。至此，国民政府解决了战时经济中最关键的指导意识，中国的抗战方得以进入较为稳定的相持阶段，即第二期抗战。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与财政有极密切的关系。健全的财政有助于金融的稳定和繁荣，而稳定的金融又有利于财政的巩固和发展。两者的紧密配合，协调发展，可以对战时经济起到促进的作用，也是稳定局势必不可少的前提。

战前，我国的货币已基本统一，但金融制度并不完善。战争爆发后，金融出现动荡，资金开始外逃，这对战时的财政经济是一严重威胁。为稳定军心民心，国民政府建立了战时金融体制，对金融实行管制，淞沪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即颁布了《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这是金融管制的开端。嗣后，又发布了《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设置“四联总处”为统制金融机构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时，采取划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业务范围使之专业化；管制外汇以稳定法币；货币发行集中于中央银行以加强其职能；集中票据交换于中央银行，以实行宏观管理；对商业行庄实行管制等措施。

通过上述手段，国民政府建立起了强有力的金融管制体制，有效地支持了战时财政，扶植了战时经济，从而增强了抗战的经济实力。但另一方面，战时金融体制下的政策和措施，也加重了民众的负担，限制了商业行庄和私营工商业的发展，给权贵和投机者造成了可乘之机。

战时金融政策包括的内容丰富而广泛，它的实施需要从经济到财政，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合作。中央金融机构既已调整充实，地方金融的改善，顺理成章地要提上日程。

对于改善地方金融，国民政府在1938年4月就颁布过《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同年8月及以后还颁布了《扩大农村贷款范围办法》及《二十九年度中央信托局、中国、交通、中农三行及农本局农贷办法纲要》等，准许地方银行以20%的准备金领用四行一元券及辅币券，积极扩大农贷范围。可惜当时因战事紧张，对于地方金融改善的具体办法，未能积极推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两次全国地方金融会议。第一次会议1938年6月在汉口召开，财政部据此拟定了《筹设西南、西北及邻近战区金融网二年计划》，包括省、县两级，一时间地方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仅四川一省即达97处。第二次会议1939年3月在重庆召开，强调省地方银行的重要性，确认其地位，实为推动地方金融的枢纽。

国民政府采取的战时金融措施，尽管存在着某些缺陷和种种弊端，未能尽收全效，但它是在国难当头，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的政治基础上，为坚持长期抗战而推行的。从总体上看，它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因而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抗战金融是个大课题，史学界对它的研究也才刚刚起步。限于篇幅，本书所征集的史料未能全数发表，加以编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西南地区各级政协、各界人士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1994年3月

抗战时期西南的金融

目 录

战时四川金融的回顾	丁道谦 (1)
云南金融业的繁荣期	夏强疆 (13)
抗战前后云南金融概述	林南国 (25)
贵州金融事业概况	刘裕远 (34)
国民政府的金融管制	胡致祥 (45)
抗战时期的贵州金融业	李世湘 (55)
昆明的抗战金融	罗文锦 (63)
个旧金融史略	徐文龙 (71)
我所知道的内江金融业	李毅熙 (80)
泸州战时金融业	卢文史 (86)
抗战时期的万县金融	蓝文惠 陈天菊 (99)
南充的金融业	吴有伦 左晴皋 (108)
徐堪的法币政策和金融措施	陈开国 (118)
我与富滇新银行	缪云台 (128)

回顾四川美丰银行	康心如	(136)
潘昌猷与重庆商业银行	石体元 刘选琛 赵世厚	(146)
我与云南合作金融	钟 瀛	(160)
抗战后迁渝的中央银行	谷昆山	(166)
抗战中的贵州中央银行	王灏祥	(175)
抗战时期的中央银行成都分行	徐天逸 龙国屏 姜梦弼	(180)
中国银行在重庆开展的业务活动	谷昆山	(192)
抗战中的贵阳中国银行	钱存浩	(199)
交通银行简况	谷昆山	(209)
陪都时期的中国农民银行	谷昆山	(217)
回忆中国农民银行总管理处	樊朝杰	(231)
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概述	俞容志	(237)
四川省银行成都分行概况	白兆渝 姜梦弼	(253)
抗战时期的建业银行成都分行	陈祖湘	(263)
设在重庆的两家外资银行	集 史	(270)
记抗战后的贵州银行	金 戈	(274)
贵阳金城银行纪事	陈之杰 阮为璜	(282)
我所知道的贵州省银行	赖永初	(286)
对聚康银行的回顾	刘裕远	(291)
抗战时期的云南兴文银行	何玉菲	(296)
兴文银行驻缅、桂办事处回忆	聂叙伦	(302)
云南矿业银行及发展生产事业概况	赵贯一	(312)
抗战时期西南的县银行	田茂德	(320)
自流井银钱业记闻	郑文波	(337)
宜宾县银行始末	侯润白	(346)

国民政府的战时黄金外汇政策	熊 甫 (353)
重庆金融市场上流通的各种金条	俞容志 (361)
四联总处调控法币流通的对策举要	缪明扬 袁远福 (363)
后方重镇昆明的若干经济问题	于百溪 (369)
抗战时期贵州使用法币概况	袁树三 (375)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货币	钱宪曾 (379)

成都经济检查大队的活动

.....	周震东 熊倬云 姜梦弼 (385)
抗战时期昆明的物价问题	李行健 (398)
贵阳区银行监察官办公处概述	张文骏 (409)

抗战时期贵州的合作金融	钱存浩 (427)
四川合作金融的兴衰	章国殷 (437)
抗战时期的贵阳农本局	田锦凤 (448)
贵州解放前的合作金融事业	志 新 (452)
抗战时期的贵阳保险业	胡问依 (458)

战时四川金融的回顾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的金融，是我国战时金融的缩影，因为抗战时期的四川是复兴的主要根据地。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它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金融中心。

一、战前四川金融的基本特征

四川金融业，在抗战以前是有一定基础的。它已经随着经济的发展，从以个体小农生产为主的自然经济中脱颖而出，向商品经济方向过渡，开始脱去旧装换新装。它从形式到内容都已具有一定的规模，远远超过了 1906 年四川最早创立的槽川源银行时期。

1937 年 6 月时，四川金融的组织机构（包括新式的银行、旧式的钱庄、银号的分支行处）有 124 家^①。重庆占其半。当时四川全省有 15 家银行总行，设于重庆的便有 9 家。重庆还有分支行处 27 家，钱庄、银号 23 家。银行、钱庄、银号并存，是战前四川金融结构的特点。它们主要集中在少数较大的城市重庆、成都、万

县、内江、自贡等地。

在资本额上，与组织机构相比是不太相称的。以具代表性的重庆为例，重庆商业银行的资本额每家最多的为 2000 万元，少的仅为 100 万元，（号称四川四小行的、资力比较雄厚的聚兴诚、美丰、川盐、川康等行也不是每家的资本总额都在千万元以上）。其中以 500 万至 1000 万元的占多数。钱庄、银号的资本额，每家多的不过 500 万元，少的仅为 5 万元，其中以 50 万元至 100 万元的占多数^②。大、小银行、钱庄、银号资本相差是很悬殊的。

战前重庆金融业的资本总额（国家银行的资本未计）为 1600.6 万元，以 9 家银行总行及 23 家钱庄、银号平均，每家仅为 50 万元。重庆尚且如此，其他地区资力更是薄弱，是可以肯定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银行、钱庄、银号，无论组织机构、人员、资本，和四川军阀、官僚、买办、豪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银行、钱庄、银号的设立，就是为少数权贵服务的。

建立在经济还不够发达地区的金融，它的组织结构是落后的、保守的，它的资本是薄弱的，所以它的发展也是缓慢的。从 1906 年创立的濬川源银行算起，到 1937 年初止，整整地花了 31 年才形成上面所述的格局，机构增长年均均为 4 家。业务的运转，基本上是围绕军政界少数人的私利进行的，其混乱状况，不仅可称西南之冠，就在全中国也是屈指可数的。

二、四川金融的发展与繁荣

这种落后的金融格局，显然是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的，1937 年抗战开始，它就越来越明显地变得落后。

民国政府决定以重庆为陪都，政府机关、学校、厂矿、商业以及沿江沿海的金融、资金等随之西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新技术、新的经营管理方式方法涌入，打开了封闭的四川经济的大门，为四川工农业生产、商业的繁荣等输入了新血液，为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抗战初期内迁的工厂 600 余家，经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处协助迁移的为 448 家，其中迁入四川的为 245 家，约为内迁的 54.67%，器材 4.5 万吨^⑧。随之内迁富有专门技术及经验的技术工人及专门人才不少。自 1938 年至 1940 年先后归来的技术工人就有 12164 人之多。其中机器技工占 40.4%，纺织技工占 21.65%，化工技工占 12.5%，文教技工占 8.26%，电器技工占 6.47%，其他占 10.72%。迁入四川的技工就有 6690 人，占全部内迁技工的 55%^⑨，这就大大地改变了四川特别是重庆战时工业的面貌，为四川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使四川成为我国战时工业的中心。战时全国形成的 11 个工业中心，有 5 个都在四川。成渝两地及川东、川西、川中、川北也掀起了重建与新建的工业热。

这些工厂发展之速，门类之齐全，实为四川有史以来所仅见。1938 年至 1941 年四年期间全省开工的 1654 家工厂中，战前开工的仅有 217 家，约占 13%，1938 年后开工的则有 1437 家，约占 87%。每年以 5% 左右的速度上升^⑩。工厂门类都是基础工业、骨干工业。如冶炼、金属、机器、水电、电器、化工、建筑、食品、纺织、服饰、文化等与国防、民生等属于第一或第二部类的工业。

1942 年又有发展。四川在这期间兴办的大中型工厂达 2005 家^⑪，占西南四省（川、康、滇、黔）同期同类工厂 2552 家的 78.57%。资本则由战前的 214.5 万元一跃而为 113001.2 万元，增长 526.8%。

机器在轰鸣，人口在增加，原材料及消费品的需要与供给，刺激着生产、消费及流通领域，需要加速调整和重新组合。要调整、要组合是离不了资金的，在财政部和四联总处的统一规划下，按照《筹设西南西北及邻近战区金融网二年计划》、《巩固金融办法纲要》等的规定，金融机构的扩建如雨后春笋，国家银行倡于前，私家银行继其后。